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90年代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 课题组

美

日

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
90年代以来

大国经济发展轨迹

欧

DAGUO
JINGJI
FAZHAN
GUOJI

山西
经济
出版
集团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90年代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 课题组

美

日

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 90年代以来 大国经济发展轨迹

欧

DAGUO
JINGJI
FAZHAN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 90 年代以来大国经济发展轨迹/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90 年代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
课题组编.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636-888-4

I. 制... II. 复... III. ①经济制度-研究-美国
②经济制度-研究-日本③经济制度-研究-德国④经
济制度-研究-俄罗斯 IV. F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658 号

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 90 年代以来大国经济发展轨迹

编 者: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90 年代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课题组
责任编辑: 郭立群 李慧平
装帧设计: 王亚英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红星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1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6-888-4
定 价: 43.00 元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90 年代 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课题组

课 题 组 组 长:戴炳然

课题组主要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纯 甘当善 刘军梅

朱一平 陈建安 唐朱昌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理论架构 [8]	
第三节 结构与分工 [14]	

第一编 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

第一章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20]
第一节 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践 [20]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 [28]	
第二章 新经济与经济增长	[35]
第一节 新经济的反思 [35]	
第二节 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政策 [45]	
第三节 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48]	
第三章 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效应	[61]
第一节 90 年代的金融改革 [61]	
第二节 90 年代货币政策调整及其效应 [72]	
第四章 90 年代美国经济结构调整	[77]

第一节	产业结构调整	[77]
第二节	美国区域结构的演变	[82]
第三节	投融资结构变化	[86]
第五章	财政收支与国民收入	[92]
第一节	政府财政收支从赤字到盈余	[92]
第二节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	[98]

第二编 日本现行经济体制的问题与改革

第一章	金融体制及其改革	[108]
第一节	现行金融制度的形成与作用	[108]
第二节	金融体制的变迁及其弊端	[118]
第三节	金融体制的大改革及其取向	[125]
第二章	财税体制及其改革	[131]
第一节	财政危机与财政制度改革	[132]
第二节	税制及其改革	[141]
第三节	财政投融资制度及其改革	[145]
第三章	产业政策及其局限性	[151]
第一节	产业政策体系	[151]
第二节	产业政策的作用	[155]
第三节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及其调整	[162]
第四章	企业集团制度及其变革	[165]
第一节	企业集团制度及其作用	[165]
第二节	企业集团制度的弊端	[171]
第三节	企业集团制度的变革	[173]
第五章	雇用制度及其变革	[175]
第一节	日本企业的长期雇用制度和劳动力市场	[176]
第二节	企业雇用制度的合理性	[178]
第三节	企业雇用制度的弊病	[180]
第四节	经济的环境变化与雇用制度	[181]

第三编 联邦德国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及其影响

第一章	德国经济社会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取向	[190]
-----	------------------	-------

第一节	90年代以来德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190]
第二节	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192]
第三节	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	[200]
第二章	税收制度改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204]
第一节	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情况	[204]
第二节	90年代以来的税收制度改革	[205]
第三节	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	[211]
第三章	社会政策的改革与成效	[214]
第一节	失业问题与就业政策改革	[214]
第二节	养老保险的问题与改革	[222]
第三节	医疗保险体制的问题和改革	[224]

第四编 俄罗斯经济制度转型及其绩效

第一章	俄罗斯制度变迁特征及其背景	[234]
第一节	制度变迁特征	[234]
第二节	制度变迁特征的形成背景及原因	[235]
第二章	俄罗斯产权制度变迁	[237]
第一节	俄罗斯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237]
第二节	俄罗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途径——私有化	[240]
第三节	俄罗斯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249]
第四节	俄罗斯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	[256]
第五节	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59]
第三章	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制度变迁	[267]
第一节	俄罗斯银行制度改革	[267]
第二节	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275]
第三节	汇率制度变迁	[283]
第四章	俄罗斯经济制度变迁的启示	[287]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衔接	[287]
第二节	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88]
第三节	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演进过程	[289]
第四节	不能颠倒产权制度变迁的次序	[291]
第五节	产权变迁更应该关注产权的市场化	[291]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本专著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课题“90年代以来美、日、欧发展模式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作用与影响”的部分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经历了70年代的滞胀和80年代的调整后,90年代出现了分化和重组。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资本与信息——得以在世界范围内高速流动,带来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其次是国际分工与交换上的深化,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发展,使经济活动真正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同时进一步激化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与争夺。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对各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世界各国先后进入经济结构大调整,不同经济发展模式间在增长成效与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分野。美国率先进入“新经济”,取得了1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则从六七十年代的高涨跌落,长期在谷底徘徊,虽已出现转机,但调整过程尚未完成;欧盟各国在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入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国经济走势普遍趋软;俄罗斯经历了10年痛苦的转型过程,经济开始强

劲反弹,但发展模式的选择显然还未完全或真正解决;曾被誉为发展中世界“奇迹”的“东亚模式”,在经历了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后,也进入了一个再探索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南亚、非洲、大洋洲——的经济发展也呈现结构调整时期所特有的分化与差距。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差距的出现和存在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的结果,但作为先天性社会—文化传统和后天性政策选择的汇合与集中以及作为经济要素依托和作用的平台,经济制度无疑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一、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

90年代世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由技术进步和信息经济发展而推动的新经济制度的出现。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革命、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向更高阶段发展。蒸汽机的出现触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由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以英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周期性特征。20世纪是工业化的世纪,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触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汽车、电话、电视机的发明、使用和普及,大大缩短了经济主体间时间和空间距离,相应减少了经济主体间的交易费用,也更大地拓展了交易的空间范围,经济周期呈现缩短趋势。20世纪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电子计算机在小型化、个性化后的逐渐普及以及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个人电脑和各种信息终端相连而成覆盖全球的通讯和信息网络,经济主体的交易费用极大地降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资源的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开始出现并利用信息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经营和销售,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剩余价值的分配,国与国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迅速缩短,而且由于信息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商品流转时间的缩短而极大地缩短了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国家间经济周期也因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等机构的全球经营活动而逐步趋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

20世纪9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在实际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美国为例(见下表),IT业在实际国内收

入(GDI^①)中的贡献率呈逐年上涨趋势,EDI变化中IT所占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19%上升至30%左右。

IT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实际国内总收入(GDI)的变化	4.2	3.3	3.5	4.7	4.8	5.0
IT的贡献	0.8	1.0	1.2	1.3	1.3	1.6
所有其他工业	3.4	2.3	2.3	3.4	3.5	3.4
GDI变化中IT所占比例	19	30	34	28	27	32

资料来源:ESA estimates derived from BEA and Census data for 1994~1997,转引自《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2000年电子商务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信息技术的成长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IT价格的加速下降则减轻了通货膨胀率的压力,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价格的降低直接减缓了整个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降低约0.5个百分点,从2.3%降到1.8%^②。不断增长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也成为美国各类设备投资以每年9%~10%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80年代这一增长率则仅为每年5%~6%,1999年IT设备在固定设备实际投资变化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

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创新,但技术进步却并不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首先,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表现。IT业在日本和欧洲也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但并未导致这两个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亚洲四小龙”虽然凭借其劳动力优势在信息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而受让了部分IT制造业,但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遭受重创。其次,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往往被高估了。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生产率悖论”显示,自60年代以来,生产率的增长率每隔10年就显示出下降趋势,而同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却急剧增长^③。

① GDI是美国的货物和服务生产中劳务和资产部分的收益。

② 《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2000年电子商务报告》。

③ 罗伯特·D.阿特金森、拉诺夫·H.科尔特:《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焦瑞进,刘新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二、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曼德尔 1996 年底为该刊撰写的名为“新经济的成就”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该刊主编谢波德于 1997 年底发表一篇“新经济到底是什么”的文章中,将新经济定义为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之后,社会各界对新经济的探讨,更是远远超出了 OECD 组织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①,而倾向于从制度的维度对这一新现象进行思考。

新经济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新经济在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改变着市场运行规则^②。新经济时代,产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知识等无形资产附加价值,知识替代资本而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企业中管理的价值增值作用日益得到重视,作为知识的载体,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并被纳入剩余价值的分配链条中。因此,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但是,作为新经济的基础性资源,知识的作用却需要通过制度的建立和设计得以保障和体现。

首先,融资制度创新,是美国新经济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风险资本融资方式创新,其主要特征在于投资过程和组织方式设计,前者体现其风险偏好性特征,后者通过制度设计将管理这一生产要素纳入剩余分配体系。风险资本通常投资于高科技企业或新创企业,甚至只是一个创意、一个点子,这种投资偏好与传统的银行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更注重资本的成长性而在对投资的高风险性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投资决策。在整个过程中,风险资本分阶段提供融资,从给创新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开始,以企业的首次公开市场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或被大公司收购而结束整个投资过程获得投资回报。风险资本的组织方式也是一种创新的形式——有限合伙制。在有限合伙制中,通常风险资本家投入 1% 的资金却可获得 20% 左右的剩余索取权,这一投资和回报比例的差距则是管理这一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要素收益。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之间、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形成紧密合作的关系,对投资的责、权、利在投资的不同阶段进行组合分配。风险资本融资方式的创新,其内在动力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要求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它以知识经济为内在驱动力,同时通过一套契约制度安排,

^①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1996.

^② 华民:《新经济、新规则和新制度》,世界经济,2001(3)。

如有限合伙制、分段投资、固定比例契约等^①,将货币资本、知识资本有机组合在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创造体系中,这是新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形式,是新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环节。事实上,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亚洲经济社会还没有完全调整其制度结构和体制框架,尤其是金融、资本、银行体制框架以及微观的企业制度基础,没有形成与新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政策体系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其次,企业治理机制创新,这是新经济时期制度创新在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中的反映。在以往的制度结构下,资本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在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互矛盾与对抗的,虽然之后也有了员工持股计划以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但是并未改变一股一票制的企业治理机制基本格局。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微观治理机制也不断创新,特别是风险资本融资机制的形成,打破了以往同股同权、一股一票制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中出现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制度安排问题^②,因为企业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行为。也就是说,因为管理可以增值企业价值,而且一股一票制的企业治理机制事实上也存在“内部人”(insider)控制问题,通过将管理层由于处于内部人地位而可能获得的隐性收益显性化为对管理层的激励措施,是企业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方面。

三、经济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产生并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的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协调作用,而且随着国与国之间金融、贸易活动的发展,这些国际组织活动的国家范围和涵盖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但是,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并不代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社会分工的范围已然跨越国界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球配置,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完全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设厂、选购原材料、组织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贸易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贸易已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① 朱一平:《风险资本治理机制研究》,〔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03。

② Jensen 和 Meckling, 1976。

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逐步形成并在国际贸易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货币、资本市场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相互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商品和金融贸易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行为,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的急剧扩大,成为一个社会 and 地区的决定性力量。它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巨变。

首先,全球化使得开放经济下政府经济、货币政策失灵。经济全球化使得开放经济下各国经济周期趋同,国内财政、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因受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而发生扭曲。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约束和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控制也越来越缺乏活力,一国政府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外部不可控因素增加,使得经济体一旦遭受外部失衡的冲击,将很难协调经济、货币政策和内外均衡。

其次,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开放经济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固然有其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不协调的内在原因,但全球化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利用这些国家本国货币、资本市场监管方面的制度性缺陷而进行大规模投机行为,则是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由此造成大量失业和恐慌性资本外逃,产业和经济结构遭受惨重打击,“亚洲奇迹”不再成为成功的典范。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尤为明显。全球化更主要的是一种货币现象^①,其中,扩张的流动性诱使投资者冒更大的风险,为新技术以及为投资于欠发达市场提供资金。然而,在信贷和投资这种货币、金融领域,极可能存在虚高的扩张现象,也可能以更快的速度陷入收缩期。如果国家金融结构已变得十分脆弱,货币紧缩则可能迅速扩散并导致各经济部门的崩溃。

再次,全球化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对跨国公司来说,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并以最小化交易成本通过其全球网络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跨国公司既是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随着世界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部分地区贫困化趋势却在加强,如非洲环撒哈拉沙漠地区等。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那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有一定教育层次的发展中国家受跨国公司在其国内投资设厂的带动而表现出

^① Michael Pettis:《全球化即将破产》,国外社会科学,2001(11)。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另一些在国际分工中日益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则很少享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且,即便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也是在牺牲国内民族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本国国民财富的积聚却并未表现出与 GDP 增长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可以视为是经济与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必然现象与过程,但随着各国经济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国政府经济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在全球化体系中拥有强势的国家,不仅其微观经济主体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很多收益,而且其影响其他国家经济的能力也趋于增强。因此优化本国经济制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已成为摆在大多数国家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同时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建立必要的国际机制与制度以维护一定程度的公平与公正,也进入了全球化问题讨论的视野。当然,全球化的一个悖论是,在本质上而言属于当地局部范围的社会规范仍然嵌入并制约着全球化的交易过程。而且,全球化整体制度的变迁也有其惰性和耐久性。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1958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趋势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重要趋势。巴拉萨将经济一体化视为一种过程和状态(Balassa 1961)。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经济单位之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障碍的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同一区域的若干国家通过缔结条约来推行它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二战后西欧 6 国间的第一个一体化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它在经济上的成功使欧洲经济一体化在其后的 50 年间在深化与扩大两个维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它由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而达到以统一货币为标志的经济联盟,实现了要素在区域内的完全自由流动,并进而向政治联盟溢出;地域上也由 6 国逐步扩大为 25 国,具有了真正的“欧洲”规模。正是由于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创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还诱发了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

见证了 90 年代以来世界和各国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时,决定将探讨制度变革对经济结

构调整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并申请了重点课题立项。课题组选择了率先推行“新经济”的美国、经持续发展后正面临艰难调整的日本与德国以及仍在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作为对象,以期通过在制度层面对若干典型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我国经济的转型提供某些借鉴。

第二节 理论架构

作为一项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课题,我们不可能就经济制度所涉及的所有方面作深入的探讨,因此在选择一些代表性研究对象的同时,我们决定围绕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其中主要是企业制度、融资制度、财税制度、劳动与福利制度等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影响最大的一些制度来展开我们的研究。我们还确定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其制度变革与作用的分析应有所侧重。为此,对于美国,研究的重点在于其开放式经济制度的特征与作用机制;对于日本,主要是分析其现行经济制度的利弊与改革;对德国经济制度的研究,则侧重于其如何调整经济与社会制度以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新平衡上;对于整个经济制度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分析集中于产权制度与金融体制的转换及其作用上。这种选择难免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显然在有限的篇幅内有突出重点的好处。

制度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和我国经济学界对此的广泛讨论,为我们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尽管我们没有刻意应用它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它的下述一些思路与方法论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架构。

一、制度和制度创新

经济学普遍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是识别那些最直接的增长条件,如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而忽略了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制度的作用,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产权制度和治理产权的获取或转让的规范体系。

所谓制度,T.W.舒尔茨 1968 年发表于《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上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提出了经典的定义:制度是管束

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①。舒尔茨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他们随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对制度的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制度分为:(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契约、分成制、公司、保险等);(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的联系的制度(产权、资历等);(4)用于确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学校、农业试验站等)。

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②,并将之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而且他亦强调这两类规则之间的协和性,即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若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新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所谓制度创新,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诺斯和戴维斯^③在《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中构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提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灵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得以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但是,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被做出。因此,制度创新需满足以下两种情形:(1)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继而,诺斯和戴维斯构造了制度创新的过程模型。他们认为制度创新过程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第一行动集团”的形成,即出现预见到潜在利润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创新即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决策者,这些人中至少有一个是所谓的企业家。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如果当时还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创新方案,就需要等待制度的新发现。第三步,在有了若干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创新方案后,第一行动集团便以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他们认为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并具体实施。第四步,形成第二利益集团,即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辅助第一行

① Schultz, T. W: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 Dec, 1968.

②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③ Davis, Lance &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9(30).

动集团实现创新的人或机构。最后一步,第一、第二集团共同努力促成制度创新。

中国学者林毅夫则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1990)一文中提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因此如果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低水平。因为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使用强制力时又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因此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继而指出,当经济增长出现不均衡时,有一些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消除,但有一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此时如果国家统治者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却没有激励去履行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只要消除政策失败的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如果诱致性制度创新是社会唯一的制度创新来源的话,这个社会的现有制度必然是能够赋予每一个创新个体超额利润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创新本身就存在一个激励机制。但是,如果现有的社会制度不存在一个创新机制,则使强制性创新成为必然。

二、产权制度、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础,界定明确和受保护的产权对于激励人们的努力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关于产权制度,产权学派有许多经典的论述。产权学派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探讨了不同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①。主流产权理论由科斯^②开辟,他首先指出传统教条的错误,提出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他以养牛人和农场主的经典案例,说明即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产权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市场交易是有费用的,在产权已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

① Furubotn, E. G. & Pejovich, 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2(10).

②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10).